

陈翰笙：《地下工作的二十五年》

送交社科院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组

(一号楼 3011 办公室，

电话：55,4631—362分机)

地下工作的二十五年

(1925-1950)

陈翰笙口述 陈洪进笔记

就于1915年去美国留学。第一年进预备学校。第二年

考进了波莫纳大学^①。在二年级的时候，听说俄国在彼得堡发生革命。为了想多知道些革命的历史，我在

大学毕业前读了德文和俄文。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

得了硕士学位^②。后来，从1922年到1924年，在德国柏林

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从奥托·施契教授那里读

了一些俄国革命史，但还没有想到中国怎样才能发

动革命。在柏林大学得了博士学位^③。在柏林遇见了

蔡元培^④，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教授。

- ① 陈翰笙留美，原拟攻读园艺馆金山橙育种，后来因高度近视不便观察植物细胞构造，而转学地质；又因野外测量不准，巧遇俄国十月革命而改学历史。广博的知识，在此两年中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② 他获得硕士学位前已对英语、德语、俄语都娴熟，为以后从事国际工作创造了条件。
- ③ 他在柏林大学以研究六国使节会议瓜分印度尼西亚而得博士学位。
- ④ 詹元培当时是国民党左派，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以“有所不为，有所不容”为学术界所称道。詹元培对陈翰笙的赏识为陈从事国民党左派间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1924年4月到北京大学教外国历史时，遇到了北京
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林涅维奇。我从他那里了解
到苏联的情况，听从他的劝告，读了马恩思的《资本论》。
他常同我讨论社会史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讨论得很
认真，兴趣十分浓厚，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到深夜，太
迟了我就在他那里过宿。^①他的谈话使我认识到：社
会总是必然会进步的，但是如果没有革命，进步总是非常
缓慢的，人民的苦难会拖延很久。

格林涅维奇介绍我认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做文
化参赞坎托洛维奇。从他那里我看到了苏联的一些
报纸杂志。因此，我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了了解，
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有所提高。

8.2.

- ② 当年陈翰笙与王地韬上过宿。两人大谈《资本论》。从此有了深厚的基础。陈翰笙王地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知道了一点革命与资本主义实际干一点工作。他认为只有《资本论》能明瞭人类历史的发展史，特别是要写的近代史、现代史，只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革命的真理。

60年后，他双目已近失明，叫人读了《邓小平史述》后，写得特别舒暢，就亲自为《邓述》作了索引。故邓书记知道后曾说他是“个好老頭。”

1924年春，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忙于建立国民党北京

特别市党部，我进北大不久就和他相识了。我的多年好

友高仁山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约我同他一起去寻李大钊

同志。大钊同志和北大讲师于树德作介绍人让高仁

山和我参加他刚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

部。^①

当时，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出了五千元给北大教授

王世杰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我和北大英美

派教授们熟识，是《现代评论》的编辑之一。大钊

同志劝我要和他们在一起，还要继续在《现代评论》

上发表文章，不可疏远他们。^②

1925—1927

- ① 李大钊要陈翰笙从国民党左派干起，为他在左派在国民党左派中，如黎元洪、宋庆龄、冯玉祥、叶楚傖、杨杏佛等同一工作，起很大作用。
- ② 李大钊又指示他做《现代评论》等国民党左派工作。这种意见正确，也只有他这样人才能在党内实行。

1925年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燃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

烈火，加深了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大钊同志激我利用

《现代评论》杂志的身份去上海，动员英租界印被巡捕

罢工。^①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见到了李立三和陈云两同志。

我们预计，要发动巡捕罢工，救济费至少要筹足七十万元。^②

可是，把各方面的钱数合计在一起，总共还不到一半。

距离我们的目标很远。因此，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无可奈何，只好离沪返京。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运动，^③大钊同志和我

同时在场。军警向群众开枪，大钊同志头部和

双手受伤，群众搀着他走出东便门。事后，他要我为

这篇文章记述这个事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我写了

8.4.

- ① 运动印度巡捕声援殖民地工人运动并同情罢工，又很艰苦事。
- ② 每月给70元，才够包巡捕家属的月生活费，此外如工价赠物就没有了。因为70元不算多。
- ③ 指1926年3月18日，李锐创口立创宁局众到洪柳子胡同^向同屋福瑞报政府请愿。陈翰笙夫妇伏地才幸免受伤。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于第68期(3月27日)的《现代评论》。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大钊同志介绍我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见面谈话。加拉罕大使劝我为共产国际工作。我立即答应。从此，我每月用英文写文章交给大钊同志，由他交给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坎托洛维奇。由他送交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上发表。^① (我妻)

这时候，大钊同志介绍顾颉刚去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她在苏联呆了一年(1926)。

1926年初，有一天夜晚，地下党员胡鄂公突然来找我。他说蔡和森同志这时正在北京，住在城外一个很远的地方，想找我谈一谈，要他来领我去他住处。去后，和森同志和我谈了一夜。谈完时，天

7.5.

① 从1911年陈炯明印子出/国际216。

已天亮。胡鄂公在另一房间里已经睡去。把他叫醒后，仍由他送我进城。和森同去与我那一夜的谈话，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他谈了广东陆丰、陆丰的农民问题。他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对中国革命前途非常重要。他劝我认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翻身的问题。^①要着重研究历史和现状。从此，我十分注意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我国的农村经济。

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执行政权，当时他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电邀周鲠生、王佐良和我三人去汉口参加工作。2月间，我们三人同到汉口，被委任为外交部顾问。2月底，大钊同志托

q.b.

① 蔡和森一信长谈，使陈翰笙从此注意研究苏联之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农村经济。

人常信给我，要我立即离汉返京。我托词父病，去
户侍疾回到北京。

大钊同志是在1927年4月6日被捕的。在他被捕
的前两天，我在东交民巷还同他见面。他同过去一
样，一再叮嘱我不要暴露自己的革命关系，要用开
明学者的面目公开活动。他的话给我深刻的印
象。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担任的工作是共产国
际的^(这是)秘密情报工作。^(所以)因为秘密工作必须同时
有公开的职务。^①

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我妻顾淑型同志
在北京艺文中学当教务主任。我们俩最接近的人，
一个是多年好友高仁山，另外两个是北大进步学者。

P.7.

(更有志地)

① 陈翰笙叫王天全的话，从此一直以开明学者的身份做国民党

后援会成员，到1950年初，有后出=十^三。

(以后又为钱党工作)

(在地下)

一个是湖南女生张挹兰。一个是历史系的男生无锡人王寅生。王寅生^但不是是同乡还有远亲，很爱好学习，常来信。

高仁山是我1920年下半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认识的。高是江苏江阴人，家在天津，在南开读中学，在日本勤工俭学时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创立新中学会。他在美国时曾发起新中学会美国分会。他主张教育救国，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育系副主任，同时创办艺文中学，实行^顿道尔顿制的教学法，聘任顾颉刚型教课兼教务主任。艺文中学是个进步学校，教员和学生中有地下党员，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刘仁同志就是在该校毕业的。校址是在北河沿，后在灯市口。

就是现在的第28中。高那次同我一起看了大钊同志后，就帮助大钊同志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高一直不知道我和大钊同志的关系以及我应承担他的工作。

那时北京大学有两派在明争暗斗。英美派的头头是胡适，日法派的头头是国民党西山会议的李石曾和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朱希祖想排挤我，捏造一份由学生具名给北大评议会对我进行攻击的指责信。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对高仁山讲了这件事。我告诉了大钊同志。他指出这是国民党右派李石曾的阴谋。他还说，切不可上当去追查真相。真相大白，反会把事情闹僵，应当找法学院的周鯉生教授想办法。我照他的话办了。周鯉生聘

我在法学院教美国宪法史。结果，我在历史系继续教
欧美通史和史学史。李石曾和朱希祖想排挤我的阴
谋没有得逞。^①

大钊同志的被害，告密人是李石曾。^②“五卅”反帝运
动后，北方军阀土崩瓦解，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倾
向革命。大钊同志派人到国民军中工作，反对直、
奉军阀。在军阀白色恐怖时，大钊同志转入地下，
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面中东铁路办事处工作。
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李石曾得到了消息，
向奉系军阀张作霖告密，并且献策取得公使团
代理首任使节荷兰公使的同意让武装军警
进入东交民巷逮捕了大钊同志。

P.10.

- ① 陈翰笙阻止李大钊指示，跨历史系，代傅高友课，侵历史系的革命祖先法利用教授评议会对他攻击指责，才击破^的李石曾等的阴谋。
- ② 李大钊被捕被害是国民党右派反共阴谋，于此得到了证实。

高仁山和张挹兰也先后被捕。李石曾趾高气昂。奉系军阀派人统治北大，学校一片混乱。我无法任教，随时有被株连的可能。

显然，京束的住处不能呆了。必须立即离开。我和顾淑型搬到小牌坊胡同里一个偏僻窄的胡同里暂住。王寅生说，他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名叫铃江言一，可以帮我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铃江言一我早认识，他表现进步，同情中国，认识不少中共党员。铃江介绍我认识另一个日本人名叫中江丑吉。这人的职业是替北京《顺天时报》当社论。当时曹汝霖有不少房产。他为了联络日本人，分出一段房屋给中江丑吉住。铃江就安排我住在中

江那里。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最后决定先到日本，再从那里去苏联，实现我的理想。中江送我和顾叔型到火车站去天津。从天津去日本。当时去日本是不需要护照的。^①

到了天津，我们改名换姓，住进了一个小客栈里，说是去上海的。第二天到神户。到苏联去必须领护照。幸好，驻神户的中国领事是顾叔型的一个亲戚。他替我们办了护照。我们乘船到敦贺（TSURUGA），又搭上日本的小密船到海参威。从那里乘火车到莫斯科。

1927—1928

一到莫斯科，我们就去找第三国际农民运动

8.12.

① 1881年第一次流亡国外，经日本去莫斯科。

研究所长沃斯尼亚钦斯基。原来，我们到北京时就预先
联系好了。当时，北京塔斯社主任明欣常来找我解
答他不了解的问题，他夫妇俩与我们都很熟识。他知
道我要去苏联研究农民问题，就建议我去找第三国际农民
运动研究所长沃斯尼亚钦斯基。大相在我走时，他
就去了电报。所以，一见面，沃斯尼亚钦斯基就知道
我的来意。他是立陶宛人，体格魁梧，声音洪亮，
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我参加研究社的工作。
立即把我介绍给这里的会计员阿利卢伊娃，说我的
生活费就由她领。然后又把我介绍给这里的研究员
马扎尔，说他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你们可以在一起工
作”。

当时，莫斯科住房相当紧张，所以这位区长又帮助我们找住处。他介绍我们认识布哈林的父親，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他也没有给我们找到住处。后来我们幸好找到列奥·托尔斯泰^(泰)的孙女，才找到了住处。她在莫斯科近郊有一间空房，是她的夏天休息的地方。房间门窗齐全，其他一无所有，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地毯。我们买了些乾草铺在地上当卧铺。每天一早乘半十时的有轨电车去莫斯科，白天在那里工作，吃饭，晚上回到那里过夜。当时供应相当紧张，日用品短缺，纸张奇缺，没有手纸，只能用报纸代替，皮肤和内衣经常抹上油墨。

会计员阿利卢伊娃是斯大林夫人，腰宽体胖，和

满习亲，自从相识以后，见面总是满面笑容。每逢向她
领工资，她总是拉住我亲切地问候领导型同志，问
长问短，她的热情令人难忘。

研究员马扎尔是匈牙利人。他同我讨论过中国社
会性质问题。他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理由是
中国东北第时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我不同意他的
观点^①。我说，那时期流通全国的商品，主要只有烟叶
和蚕丝，那不过是商业资本，只能说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论过好几次，都是各不相让。

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情况与欧美的学术研
究机关情况大不相同。欧美的研究机关的工作人员大
多是有专门知识的学者，这里的人员很少是大学毕业生，而

8.15.

① 马礼午的观点,是错误。

且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十之八九是被安插进来的一般干部。有的不过是中学程度。同我一起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人，都欢喜辩论，但却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总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句为依据。有一次，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同我讨论问题，到了理屈词穷的时候，竟然断定我没有读过马列著作，竟气用事地说：“你读过《资本论》没有？你们中国人是不懂得中国历史的。”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够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用事实求是，根据历史事实，刻苦钻研。我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深为反感，对他们任意把那些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干部安插到研究机关来的办法，非常惊奇。当时研究所的工作很不踏实，也没

有积累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呆了一年，到了1928年夏天，我和顾敬型同志就急于想回国了。^①

(经宋庆龄介绍)

1927年12月间，我在莫斯科认识了邓演达。他是在九月间因国民党宁汉沪三方面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时，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后来莫斯科的。

有一天听说陈友仁 and 宋庆龄也来到莫斯科，都住在红场附近的饭店里。那里是苏联的国宾馆。陈友仁是我在北京1925年夏天认识的。他为了想在北京办一家英文日报，来找我商量办法。可是，不久广州打电报给他要他南下工作，办报的计划就作罢了。1927年初在武汉又有过来往。所以很想看看他。他介绍我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同陈友仁讲话用英语，同我

8.17.

- ① 从此，陈翰笙对教条主义作风之危害痛心疾首，为实求求正之
作风仗义执言，任不畏权势，数十年如一日。他认为中共必须
与劳苦的这种作风拉开。
(教条主义)

用上海话。下午她招待我们喝茶，谈了一些时事。宋庆龄
诚恳纯朴，没有教条八股的词藻，流露着革命热情，
令人感到亲切。^①因此，1928年夏天钱和顾叔型回到上海
时，又去看她，她住在莫里哀路，房子是一位华侨送的。

1928 — 1933

我回到上海，没有人知道我是从苏联回来的，只以
为是从日本回国的。尽管如此，过去东一起编《现代评
论》的国民党右派前北大教授王正杰质疑心我是中共
党员。当时他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长。院长蔡元培建议要我当副所长。王正杰婉言拒绝。
蔡先生就介绍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王云五那
里去整理所谓《中国百科全书》的书稿。

8.18.

① 陈友仁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宋庆龄的形象十分动人。从此

关系良_好

幸好，次年（1929）王克杰被调往南京任法制局长。蔡元

培就去找王克杰商量，并得到他的同意，让我^去一年合同期满后前去到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他则已兼任所长。

回想到我在莫斯科同马扎尔等人辩论时所引起的对教条主义的反感，我就想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机会来调查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到研究所，我就聘请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王寅生为助理研究员。起初，我们在上海进行日本人办的棉纺织厂包身工制度的调查。那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反动派对我们的注意。我们提高了警惕，立即转变方向，多做农村经济调查，避免社会调查夭折的危险。随后，我就同王寅生、傅锡昌、傅稼夫、石凯福（现名石樵）、钱俊瑞、秦柳方等同志到

无锡、保定、潍县、江苏的蒙台子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了：地主阶级、军阀官僚、高利贷者和外国商人的剥削，使得我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以致农民破产，国民经济没有发展的可能，除土地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①

在上海的时候，由于王寅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潘梓年，谈过几次话。也在那时候，托洛茨基述之不止一次到我家来同我谈话。他认为斯大林对待托洛茨基是不民主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劝我不要迷信共产党。他的用意是怂恿我参加他们那一派。

那时，邓演达住在愚园路 陕西北路
西摩路（今中山东路）常来

看过我几次，主要是谈教育改革问题。有两次是和章

P.20

① 从中国农村调查中，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任务，在调查工作中，培养了中国一代经济学者。在土地革命时期，于国民党统治区内，在经济学界开辟了“第三条战线”。

伯钧一起来的。我们谈得很融洽。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全部经费是很有限的。我们尽量把经费用在农村经济调查方面。因此，我们渴望进行的剪报工作，经费就没有着落。但是，要了解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剪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碰巧，我有一次同当时铁道部长顾孟余谈话，从铁道部弄到一笔钱，剪报工作才能进行。顾孟余是在德国学经济的留学生，在北大常同事两年，比较熟识。他问我月薪多少钱，我说大洋四百元。他再问我够用不够用，我说，我们夫妇都有工作，又没有孩子，当够够用。不过，社会科学研究所打标订阅期刊报纸，却缺少这笔经费。顾马上说：“你就标是铁道部的顾问，月薪四百元，

夠不夠？”这样，我就请了李沧江和曹轶欧担任剪报工作。那时，曹轶欧和康生都在上海大学。李沧江是江苏宜兴县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洪湖赤卫队中牺牲了。

里

有一次，我到莫^里哀路去看宋庆龄，遇见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她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驻华记者。她告诉我她住在霞飞坊，要我到她那里去谈之。彼此熟识以后，就常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和时事问题。她常把她写的通讯报导给我看，要我提供意见。她从我了解即当时蒋政权的矛盾和反共媚外的情况。因为，我当时常之见即国民党官员如陈公博、顾孟余、褚友壬、朱家骅、段锡朋、何思源之类的人

①
物，所以能够了解统治集团的内幕。可是，史沫特莱当年就被《法兰克福日报》解雇了。后来听说，这是政
党丁文江和胡适破坏的结果。他们请求德国驻华
领事要该报社停止她的工作。

当时，第三国际太平洋劳工组织在上海办了一个
②
英周刊，叫做《上海新闻》。我和史沫特莱常用笔
名在这个周刊上发表文章。史沫特莱常到宋庆龄那
里去，也常和鲁迅谈天。我和鲁迅见面谈天是宋
庆龄介绍的。我说，我就是他在《语丝》上投刊
的“吾家世兄”，他听到了，哈哈大笑。
③

由于我和邓
演达谈得来，邓又在宋庆龄面前常提到我，所以，
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

8.23.

- ① 小陈云博，张孟余，唐友玉，朱冠群，段锦山，何思源等信件。
和通蒋政权及共墙外的内幕，提供史料档案。
- ② 从此，彼此明白了政治立场一致，以后在合作中互相默契。
- ③ 据周天度写《蔡元培传》第217页，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会员名字中，陈鹤亭也在内。

①
的时候，有时要我护送难友脱险或送交信件。1931年6月15

日白色职工国际太平洋劳动会议干事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

捕。第三国际请了一位瑞士律师来上海为牛兰夫妇辩

护。我曾几次把李友龄的信件送交那位律师。当时，

白色恐怖严重，一人送信，另一人远远在右随行，准备

②
一人遇险，随行者可以了解情况。记得有一次，我

去《申报》馆送交民权保障同盟的信件，随行人

是谢树英。他是德国留学回来的，现在在北京

钢铁学院当教授。

楊杏佛是邓演达的好朋友。我在中央研究院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些出版品和几次实地考察，多

亏总干事楊杏佛的努力才能实现，否则是不可能的。

8.24

① 这事国民党反动派当时似乎定意过。

② 将市属各道设营救中兰夫妇。

有一次，我从宋庆龄那里出去，五分钟后，杨杏佛去看她问
她刚才谁来的。宋就没有告诉他是我在那里的。^①邓
演达被捕后，蔡元培用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写信给陈
诚进行营救。蔡元培要我办这件事。我找了彭学沛
带我去见了陈诚。^②

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提出要同我结婚，
我告诉她我已经结婚。过了两个月，她告诉我她已经
和左尔格结婚，要我认识左尔格。一个星期后，有一天，
早晨我去看史沫特莱，看见左尔格也在那里，知道他
们已经住在一起。后来我知道左尔格是苏联杰出的
情报工作者。我还从史沫特莱认识了在上海满铁
研究所工作的尾崎秀实。他是和左尔格一起工作的。

P.25.

① 案. 陈之角关系反密。

② 为黎文培曾叔叶增述, 陈翰呈. 合庭书证。

有一次，我跟左尔格提到了孙冶方。左尔格颇意见之
他。我约了孙冶方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见面。可是，
出乎意料，孙见到左尔格用俄语问好。左尔格装
着不懂赶快逃走了。对我说以后也不要见到他。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孙冶方。左尔格的父亲是德
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精通德语、俄语、英语。他
用^德美国记者名义在上海收集情报。他以纳粹分子的伪

装结识了上海的德国领事和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团
总部的人物，他在上海从白俄总部倾听白俄流亡
者的谈话。左尔格在上海只讲英语，不能暴露他懂

俄语，也不让人家知道他认识我。我和左尔格联系
是通^过尾崎实。

①
1932年1月左尔格通过尾崎实给我一封信，要

我陪他到西安去一趟。约定在某天某时手提打字
机在徐州火车站候车室等^(他)一同乘火车去西安。我们到

了西安，就找了南汉宸（陕西省长杨增城的秘书），第
二天南汉宸招待我们午宴。过了三天，左尔格要回上海。3

是得到消息^(当)，地方发生瘟疫，火车客运在潼关断绝。

左尔格在西安弄到了一架由德国人驾驶的军用飞机，

把我们用飞机送往洛阳。到了洛阳，我们分手，他
回上海，我乘火车去太原到五台县去看冯玉祥。

因为我在美国时认识了查良钊。返回后，查良
钊与高仁山一起创办了艺文中学。当时，查良钊在
冯玉祥那里。我去看查良钊，通过他认识了冯玉

P. 21.

① 1944^年左宗权^和左奇^等在东京被日^军杀害。左奇^在左宗权^时，有^意送^与革命^了。此^在苏联^{还有}左宗权的铜像。

祥和李纯全。李纯全谈话说较多。在那里还遇到薛笃弼。目的在于了解冯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住了一个星期就回上海了。

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

可是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总是不放心我，一直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有一次，他对他的同事们说：“陈翰笙这个人，看样子不象是个共产党员。听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还特地到无锡下车上坟扫墓呢。”但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他终于说服了蔡元培让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上海劳利育路搬到了南京鸡鸣寺。

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就要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堂去作一次演讲。这是我到成贤街

中央研究院去看院长蔡元培时，蔡先生告诉我的。我流露
内心的厌恶。他怕我为难，就说道：“好在你可以自己
出题自讲，还是去的好。”我想，既非讲不可，我
就选定了“田赋与田租”的讲题。我站在讲台上讲，
陈立夫坐在主席位上听。讲完后，他送我出大门，边
走边说，他说不用害怕出什么财政问题，他举起
双手作出倾盆大雨的样子，说：“我们可以发行许之多
的法币，毫无问题”。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好笑。我早
已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财政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从
中国银行研究室主任唐有壬和他的助手曹南梅（女）
了解到蒋宋孔陈从公债里捞到了大量钱财，这样下去总有
一天要垮台的。我只好一言不发忍笑而去。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是很头疼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了敷衍他们的面子，在我们

所写的《兵差与农民》书名上加上了“中国北部”的字样，其

实内容并不^单限于北部。我们在1932和1933所写的《无锡的

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调查报告，被傅斯年扣押，

不但不让发表，连原稿也不知下落。1933年6月18日，中

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暗杀。我在中央研

究院孤立无援，而且研究工作已经遇到了障碍，不可

耐有何发展。因此，我向蔡元培院长提出辞职要求。

他很谅解，给了我一个^{通讯}研究员的名义。从此，结

束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

①

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策动孙

8.30

- ① 王昆仑在北大读书时，陈伯达已在当教授。斗争时，王伯达进步时，同陈有配合，1948年夏，王在组内，陈，略为王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言语简洁明快，富有说服力。王非常佩服。

科创办中山文地教育馆做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工作。

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也说服了孙科与我接触。我于

1933年10月间在南京见了中山文地教育馆理事长孙科

和总干事马超骏。他^们聘请我做该馆特约研究员。

我提出了广东农村调查的计划。当年11月底开始用

中山文地馆、岭南大学名义在广东进行调查。宋庆龄

知道了这件事，就建议我是从中山县开始。她给我

介绍信去看中山县模范县长唐绍仪。^①这个办法果然

生效。中山县开了头，其他各县就毫无障碍，并以此

为荣。调查时正是陈铭枢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

时候。团员中有王寅生、孙勉之（即孙治方）。薛

西林（即薛暮桥）也曾加以协助。调查报告《广东

8.31.

1. 富庆站 支援陈翰奎 在车场农村调查。

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于1934年出版，后来常有两种日文译本。和德文译本。

广东调查使我对军阀统治的认识和香港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历史知识有所提高。还发现了有关袁世凯的史料。我在沙面遇见一位美国副领事，经过攀谈，才知道他正是我在美国波莫纳(POMONA)大学的先后同学。我问他，能否让我看^{美国}领事馆的档案^①。他说，可以看，但不许抄写。我发现袁世凯的两三事，给我深刻印象。①袁世凯有~~在~~在广州垄断军火进口。②袁世凯有~~个~~英国人当他的私人医生，其实是~~个~~英国特务。袁世凯也知道，就将计就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袁世凯通过这位英国医生

8.32.

① 工作做计，以查因及因金时银的控查，这[乎]述之一。而且从中
发现了表出~~（党）~~国媚外的一条内线。
~~早有~~

秘密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Lord Salisbury) 献策

(在天津)

要英国出面召开八国联军代表会讨论协约国办法，同时

向西太后推荐袁世凯主持和平会议。这件事说明军

阀投靠帝国主义的祸根早就~~暗~~埋下。

1934 — 1936

1934年2月，我从广东回到上海，觉得中山文化教育

育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多大希望。我决定

从孙科取得特约研究员的名义，加上中央研究

院通^讯研究员的名义，去日本东京东^方文库研究中国

近代史。^(不过)这是我的公开职业。去东京前左尔格与我

约定，他也去东京，要我专与满铁株式会社里的地

下共产党员来往。离开上海前，我用茶叶专家吴觉农

商量，共同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①。我请他在我不在上海的时候，代理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的职务。此外还创办了一个月刊，名叫《中国农村》。

1934年春，我和顾淑型同志在东京租了一处小房子住下。我常到东方文库去看书。^② 东方文库的书籍原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詹姆森的藏书。多半是欧美传教士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著作。原先存放在北京，后来被日本人买去，存放在东京。我打算利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史。那时我国驻东京的副领事李肇基介绍我认识了郭沫若。在东京的交往，最令人难忘的是郭沫若。每次会晤，常常畅谈。记得那年底，他邀我吃晚饭，畅谈痛饮，我喝醉了躺在榻榻米上熟睡不醒，他打了电话后，顾淑型来

8.34.

- ① 早年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員已有五千人。薛暮橋主編《中國農村》。
- ② 達尼銀幣二次流亡國外。

(我和领教型车轱辘街站)

接我回家。有一天在路上我们看见了左尔格，可是彼此不打招呼，^(装着)互不相识。我的秘密工作是通过尾崎秀实与满铁的共产党员联系。可是他们有些人是在上海的。因此上海的一些外国朋友是与我有关联系的。有一次，已经约定1935年三月某日在东京百货商场与上海来的人见面。可是，到了那天，不见他来，我不放心，所以回上海来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从神户乘船到上海找史沫特莱就会分晓。那次，在船上遇见大公报经理胡政之，交谈甚洽。在船上看英文《字林西报》上有消息说有个国籍不明的西人在上海被捕，从他身上搜查出三个护照。我大吃一惊。因此，步步不离胡政之，同他一起上岸，一起进新雅旅馆，一起登记，但没有定房间，马上到霞

街坊去看史沫特莱。她一见到我就大声喊叫，“天大的幸运，你来了”。“从这时起，不许你出门。”到了晚上，她

送我到^{路易}利·艾黎 (Luwa Alley) 那里，同他工部局的

同事英国工程师钱普林 (Chamblin) 住在一起，那里^{有客人来}是~~没~~不~~利~~的。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艾黎，他早于30年代

就同宋庆龄保持密切的关系。由潘汉年领导的^{艾黎}地下党电台，就设置在^富他的~~通~~路里。史沫特莱

把我送到那里，可标是最安全的地方了。我在那里大约住了两个星期。

到上海的第二天，史沫特莱建议把顾淑型^{同我一起}接来，由她安排去莫斯科。我国有顾淑型的身体

不好，一人行动不便，而且^{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回来，

所以就请王寅生去东京接她来上海。返回上海后住在工部局一个德国工程师名叫哈姆布尔格(Hamburg)夫妇寓所里。不到十天，史沫特莱就办好了去苏联的手续。艾黎送我上一艘停在海关附近的苏联轮船。同时由哈姆布尔格夫人送顾叙型上船。我们两人被关在船长的厕所里。两人站了足有两小时。等船开出吴淞口以后，才把我们放出来。^①到了海参威有两位苏联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到莫斯科不久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有两位苏联人陪我们

1927年

在红场上观礼。~~1927年~~我们两人曾在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看到了斯大林夫人阿利卢伊娃，这次，在红场上又看到斯大林本人。观礼完毕，他们送我们回旅馆。

p.37.

① 這兒係第二次試驗。

过了几天，忽然有人来带我到一个办公室去谈话。是一个穿

军装的人和我谈话。^①他首先问我，当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件
责任是什么？我答：服从党的指示。他说，不对，第一是交
(按月)

党费。^②接着他就说：“你是参加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人。现

在他们的总干事爱德华·卡特 (Edward Carter) 曾到苏

联太平洋国际分会，^(学苏联)分会要推荐一位学者去美国和欧文·
(要)

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编辑英文的《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 季刊。苏联分会找不出人。但我们知

道，去年在加舒夫开会时，有个中国学者叫陈翰笙，他

可以担任这项工作。”接下去，这位军人说：“本来

我们打算派你们两位去美国工作。^③可是，原先在上海

编英文报《上海新闻》的易乐生 (Harold Isaacs)

P. 30

- ① 这飞机是国际航线的飞机工作人员。
- ② 话人四时了列宁的建党学说。这反映了苏联党内的高度
思想。
- ③ 话人对此不认同。

现在回美国去了。这是一个美国托派人物，他认识你。因此，

现在你们如果去美国，就只能把你们转到中国党里去了。

就这样，我和顾叔型就被送到王明和康生那里去了。

那时候，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委第三国际的代表。

1935年11月底，我们夫妇两人去见王明和康生时，

他们两人在卧室里谈话，告诉我的，我们两人已

经转入中国党内。^①

1936—1939

1936年2月间，康生告诉我：“纽约太平洋国际

学会要办《太平洋事务》等刊。等刊总编辑是英国社

党识的美国学者。总干事卡特叫几个分会去找人，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分会都找过了，却找不出人来。想

p.39

- ① 在按钮中，陈发强使用了“本色”，廖生金运用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来记。

（五）
来是故意要来苏联找人。借此可以拉拢苏联分会。现在我
们和苏联打称推荐你去。^{我伯}（打称这么说：“听说你晚在在巴
黎，^{所以}要卡特到巴黎去找你。”你们现在就要准备走，去巴黎。

现在卡特在伦敦，五月间回纽约。所以，你们四月初就
应当去巴黎。卡特五月初可到巴黎来寻你。”我即巴

黎后就写信给卡特告诉他我从中国来巴黎。我
们从莫斯科去巴黎时还带了一个青年去巴黎，因为他
不懂外语，没有人带，旅行会发生困难。他就是~~里~~^里

克里，是去巴黎到《救国日报》社工作的。我们到了

巴黎以后，即到瑞士去了一趟。卡特给我来信，要

我们马上到英国去与拉铁摩尔见面。四月底我和顾

叙型去伦敦。不久，卡特和他的秘书、拉铁摩尔、

爱尔塞、左荣新、和线儿的夫妇两人一行共六人乘船去纽约。

(25日)

五月~~中旬~~到达纽约。

线儿记得，在线儿离开莫斯科之前大约两个星期，

萧生对线儿讲，要线儿在美国不要让人家知道是党员。这

样才能配合饶漱石的工作。当时饶要到纽约创办

《华侨日报》。打算把在法国的《救国日报》停掉，

(搬到美国去)

用那里的铅字办《华侨日报》。同时，萧生还告诉线儿，

杨波也在上海加入了党，人家都不知道。上海的著名

律师章士钊也是线儿的党的同情者。他还说，在纽约

可以同冀朝鼎合作。^①在离开莫斯科前，有一天潘汉年

同志到旅馆来寻线儿，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要通过你~~要同党~~人~~联系，可以~~通过~~和~~人~~联系。”^②

和

好在

宗庆盛

联系

你仍在上海就已经很熟悉。”

8.41

拉鍊摩多

- ① 當年曾任有名顧問的(Owen Latimore)現在已退休在美國，此人當時最佩服的就是葉朝新上陸箱軍。
- ② 同余反斷的自語。(以此更密切)。

那次是我同潘汉年第一次见面，我在上海和潘梓年同志交错过几次，所以彼此了解。

我们五月间到纽约。一到纽约，冀朝鼎果然就来寻我们。他在纽约办了一个英文月刊。他同纽约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人如卡特等也很熟悉。

我们到纽约不久，遇上了陶行知和跟他一起工作的陆瑾。陶行知是国内群众团体派到美国做民间抗日宣传工作的。陆瑾是他的助手。不久，陆瑾就和饶漱石结婚了。过了半年，铅字才从法国运到纽约。我们就同徐永煥、陈其瑗、程明昭组织

①
华侨日报社。从到纽约时起，我就参加了《太平洋季刊》的编辑工作。我和威廉·霍兰^特 (William Holland)

接触较多，同拉铁摩尔接触较少。^特罗兰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每逢苏联外交家和知名学者来^{纽约}访问，都是卡特、罗兰^特和我接待。

罗兰^特和^特丘莱斯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同情苏联。

1937年2月，我应加舒大五太平洋国际学会分会的邀请

到加舒大的中部与西部五个城市作公开演讲，详细解

释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同年夏季我被波莫纳大学邀

请，在夏令学校里，讲中国政治六个星期。我乘这个机会

会尽量暴露了蒋介石的政治面目。这时候，我和顾淑

型两人在纽约参加了救济战时难童募捐委员会。

1939—1942

1939年5月，我们离开纽约去香港。路过菲律宾

在马尼拉呆了一个星期，同菲律宾朋友接了头，五月底

即香港。当时，宋庆龄和梁叔德曾即码头上来迎接我们。

有一天，方承志告诉我说，潘汉年要来看我。我对他说，
就通过你
线用方承志接头好了，~~不去香港~~。我知道方承志是

公开露面的，潘汉年是隐蔽的，我不应当暴露我的党员身

分。后来，我跟潘汉年联系都是通过朱伯琛。我在香港特

面做了两件事：①办了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这是胡

愈之叶到港同我接头创办，由新华社发行的。每期用

航空寄发全国。这个刊物^是最早把皖南事变(1941.1.14)

白报界国外的。后来叶挺经过香港去延安，经孙冶方介绍

曾来看我，表示感谢。②我帮忙组织中国工业合作

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注册)何明华

为主席，斯诺和艾黎为委员，我担任执行秘书。

7.44

① 舰员在休息时，国际电话铃声，使他们对今天在西斯约特道夫。这一消息即飞陈翰笙发出的。

进入延安等地的

两年内收到的捐款约有1.800万美元。捐款都来自海外，大部分来自北美、西欧和东南亚各地外国人士和华侨。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12.8)那天晚上，菲律宾马戏团正在香港演出，义演收入大部分捐献给工业合作社。收到的捐款都分给抗战后方如江西、福建、安徽、河南、陕北等地的工业合作社。我还记得^①记给延安的捐款是李富春同志具名签收的。我们的汇款都是^(经过) ~~(姓邓)~~ 姓邓的通过 ~~银行~~ 银行办理的。回想起我在香港认识了不少人，除国民党人士外，印象较深的是要街(沈端先)、范长江、金仲华、时铁生等。

香港沦陷(1941.12.18)一个多月后，我和顾敏

P. 45

- ① 当时给逆党的捐款，必须经过重庆国民党政府，才不致受到孔祥熙等的扣压。

刑乔装社员乘搭难民的轮船，于1942年2月初离开香港，经过台山、开平、梧州到达桂林。

1942—1946

我在桂林同喀锡昌和简竹坚一起编《工会月刊》，还帮助顾淑型办了一个妇女工业合作社。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合作）}工业总社派了通用潜来帮助我们开展工会运动。1942年底，我为了工会工作到了江西赣县去看了^{（合）}工会办事处主任陈素昆。以后，还到了福建漳州。回到桂林以后，应桂林师范学院^{（石历）}院长林励儒的聘请，任该院西文系主任并兼了些课。我刚到桂林不久，从香港来桂林的时友^{（同母）}给我100美元，说是党给我的，我没有收。还有从前在美国认识

的上海中国银行研究室的陈育梅（政学系时禹九的夫

人）送给我法币6000元，我婉言谢绝。我说，我非

在桂林师范学院授课，所以不需要钱。我在桂林两

年间^①常到国际俱乐部去与来往的朋友，其中有李
四光、戴爱莲、田汉、萨空^子了、柳亚^子、丁燮林等人。

1942年11月，桂林举行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会，我和

杨刚请了英国驻桂林的代理总领事布赖恩

（Derek Bryan）在大会上报告英国人在法西斯

斗争情况。^②

在那时候，我经常回在赣县，常从赣县到重庆去

寻李美龄，因为他有个姓^李张的女儿住在桂林，所以

中途在桂林都要住几天，间或在国际俱乐部里遇见他。

8.47

① 在桂林两年期间，曾将廖正杰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以假管救，
向外国新闻记者在巧妙地带开了出去，事后何香凝亲笔寄
了一封老梅送给他的信。

有一次，我聊着往回屁股坐在马台上，两腿挂垂，同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美国记者谈天。^①还有一次，我见这位
美国记者在浴室里替蒋经国洗脚。

当时，桂林有个英军服务处，头儿叫做赖德上校
(Connel Reistle Ride)。因为当时有数百名英军困
在汕头，这个机关是为英军服务的。因丘莱荪的介
绍我认识了赖德。赖德要找一个懂日文的中国人
去帮忙，我就介绍了孙亚明（中共党员）。我还认
识美国驻桂林的副领事，是个自由主义^的记者，叫
做查尔斯·塞维斯（Charles Service），他也是我
们母校波莫纳大学毕业的。他要找一个中文秘书。
我介绍了杨承芳（中共党员）。那时，我和党的联

8.48

① 美国记者当时常去访问蒋经国，当时他为了解情况

是通过李亚群。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战委员会书记。我和李亚群来往是不让人知道的，谈话都在野外树林里。解放后，1952年我在北京还同他见过面。那时，我的外甥女婿，^(英国)在桂林英国新闻处工作，由于他的关系，我认识了新闻处之长史密斯。

有一天陈此生来找我，要我第二天到他那里去吃早饭，说有事要和我谈。我到他那以后，还没有吃早饭，他就拉我走出房间，在室外空地上，坐车拆掉了房屋的基石。他低声对我说，重庆军工委员会有密电给桂林军委会办公厅，要逮捕一批人，名单里有我。他劝我赶紧离开桂林，最好出国到美国去。我回去就给顾敬型商量。第二天，我和顾敬型就到全州暂避。同

时，托顾淑型的姐夫孙树珊设法帮我们办出印证的
护照。当时，孙树珊在重庆当交通部参事。护照上用的
都是假名字。还在桂林托人找了一家商行作领出国护
照的保证人。在张锡昌那里工作的简竹望（现在在
香港化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给了我们600美元，作我们
去印证的旅费。护照办好后，我们从全州回桂林。
(服) 英军服务处的软德上校帮我们向印度新德里英国
新闻部远东局联系好，让我们两人在那里工作。经
过桂林英军服务处和桂林英国新闻处的帮助，我和
顾淑型乘上英国人驾驶的汽车到达昆明。第二天早
晨，我和顾淑型去同盟会党员清华大学教授呼奚若。
在他那里吃了早饭，就乘人力车去飞机场。英国驻

昆明领事馆为我们安排一架十座军用飞机，飞往印度加尔

各答^①。下了飞机，在通往市区的路上，颇微型听见中国

人群中有人说中国话：“他妈的，到这鬼来了。”当时驻

在加尔各答的中国机关很多，重庆派来的特务也很多。

我在加尔各答不到一个星期就去新德里工作。在新德

里不久就认识了德里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来希(Curashi)

教授(印巴分治后任巴基斯坦教育部长)。他邀请我在德

里大学历史系任入学考试评卷员。我还加入了印度

的历史学会，两次出席他们的年会，因此，有机会

游历了许多地方。我在新德里认识了印度历史家潘

尼迦，常与接触。后来，他当了印度第一任驻华大

使。1945年9月和11月，我在印度农村作了些调查

851

① 通し他方の次派に因り。

国，认识了一些印共学者。如南方的南布迪里巴德

(E.M.S. Namboodiripad)，孟加拉的安必加·高士

(Abinia Ghosh) 和戈帕尔·哈达 (Gopal Haldar)。他们

提供了一些材料。有一部分我把它列入我即将写的《~~印度和~~

南亚农村
~~古塔斯~~经济区域》(1980 ~~英文本~~ 释) 的注释里。在新德里，

我常常遇到一些过路的新闻记者，如杰克·塞维恩

(JACK SERVICE) 就是其中之一。萧生那时在延安，

曾经两次通过美国记者给我带来党内文件。那时，

我与萧生还有往来。

第二次大战结束将近一年，前桂林英军服务处处长

赖德上校将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校长。他邀

请我去当教授。可是，正在这时候，1946年秋天，英国

记者彼得·汤森 (Peter Townsend) 从北京带给我由周恩来和序承志两同志署名的一封信条, 上面写着要我直接去美国, 不必回国。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赖德的邀请。

1946-1950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美国, 这次在那里呆了四年。在这四年间, 我曾在美国中部调查了美共在农村的影响。通过詹姆斯·艾伦 (James Allen)^① 了解美共的内部问题。我曾同唐明昭、徐永煥、徐鸣等一起参加留美党员座谈会^②; 同浦寿昌、俞沛文、浦山等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夏令营^③。我还参加薛萍鼎主持的“适社”座谈会^④。那时, 我还和脱离了美共的党员, 如苏开明等人取得联系。我每周写信到香港与乔冠华联系^⑤。

P.53

- ① 丹·艾伯是美共主席威德·福斯特的机要秘书。
- ② 西美党员联谊会，是董亦斌同志1946年在美招王组组织的。后来用恩赐门名字或命名为“中美互惠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先后有徐市顺、唐明照、徐鸣、蔡晋义、杨刚、赖正九、浦寿昌、薛保寿。
- ③ 即北美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是内迁宅由徐鸣、浦寿昌、俞沛文、浦山领导建立。
- ④ 是内迁宅由薛保寿负责创设“建社”，乃公开成立“西美科协”打基础。乃是在1949年1月，召集大批科技人员回国参加北会议建立。
- ⑤ 董亦斌同志王组负责人。

我到美国后，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聘教授，
讲中国历史半年。半年后，应拉铁摩尔的邀请，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参加新疆史地研究工作。
后来出版了《亚洲腹地边疆》这部集体著作，结束了那
项研究。一年以后，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印度历史研究员
两年。以后，应纽约亚洲研究所聘请，担任教授，
每周讲课一次。^①

由于从前认识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美国友人介绍，我
认识了詹姆斯·艾伦，通过他和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Field）认识了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同福
斯特见过几次面。^②

冯玉祥和李德全从旧金山到华盛顿去看前驻华

854

- ① 对于抗联厚言曾对军政界引起了好感-服安的作用。
- ② 沟通了政治领导层对于台山的胜利有了解。

曾

武官马歇尔时，~~在~~他和拉铁摩尔会面的场合，我和

冯玉祥、李德全来往过几次。我们还谈到他们当年被困
在山西的情景。据后来杨刚告诉我，当时外交部副部长

章汉夫认为我们不应^让冯玉祥去见马歇尔。章汉夫以为冯玉

祥之所以到华盛顿去见马歇尔是由于我们没有阻止他。

我向杨刚，冯与马歇尔是老朋友，为何不去见，见了有什么

不好。章汉夫怀疑冯玉祥想取得马歇尔的帮助，东山再起，

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①

1950年在纽约时，我曾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

卜卜维奇（Popovitch）讨论国际问题。他认为苏联在与

南斯拉夫贸易协定上的货物价格是不公平的。到³1951年，

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馆第一任代办。^②

P.55

① 实际上坦士科与华威制[?]为看高顺时[?]使潘友新,以
松高华[?]重[?]而[?]。并以[?]则怀疑[?]对[?]有
松合[?]开[?]才[?]三[?]据[?]。此[?]中共[?]立[?]美[?]作[?]到[?]于[?]他[?]立[?]场[?]因
曾有[?]国[?]策[?]要[?]求,坦士[?]马[?]歌[?]出,士[?]潘[?]友[?]新[?]见[?]而,却[?]给[?]宣[?]满[?]寿[?]昌[?]的
都[?]清。坦士[?]马[?]歌[?]不[?]早[?]就[?]相[?]识,比[?]华[?]威[?]制,一[?]定[?]有[?]友[?]谊[?]性[?]拜
陈[?]翰[?]墨[?]时[?]的[?]判[?]断[?]是[?]对[?]的。

② 苏[?]方[?]要[?]价[?]格[?]上[?]有[?]所[?]飞,是[?]事[?]实。

1950年春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来了两个人问我

何时回国。我答：我与纽约亚洲研究所有合同，明年合同

期满才回国。他还问我，听说冀朝鼎被收到旧金山中国银

行当行长，有没有这中。还问我同史沫特莱有没有来往。

我说，在上海见过史沫特莱，以后没有见到过。事实是我

在纽约也见过她。后来

徐鸣从纽约回过北京一趟，带给史沫特莱两千美元给她

作来中国的路费。这笔钱是我亲手交给她的。^①

1950年¹²~~10~~月我和顾叔型从纽约乘船到英国。^②签证是

由南斯拉夫的^{波兰}中~~中~~维奇帮忙办理的。到了英国，我去剑桥

大学看了拉铁摩尔等人。一周后，乘飞机到捷克，在那里

见到了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伍修权、龚普生、乔冠华、浦山

等同志。他们启程后，我们就转入波兰。在波兰呆了

P.56

- ① 这是给鸣回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中共在苏工作领导小组的24.9月
记时顺成记及陈静斋的来信，中共中央曾给她的答复。
- ② 此后，他借周恩来电报记录及陈静斋女英文《中国建设》，吩咐他
立即回国协助。陈静斋坚决拒绝了，许多阻力，绝逼陈静斋回国。

一个月，等候苏联的签证。取得签证后，我和顾表型

经过苏联回国。到达北京的时刻是1951年1月31日晚间。

从此就结束了我二十五年的地下工作。

[为响应社科院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组
1984年1月7日的通知，从3月6日起
开始口述参加党和革命的经历。共计
经过31次，10月8日口述完毕，11月17日
定稿，11月19日复核了全稿。]

p.57.

- ① 陈翰笙文集将在1985年上卷中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收集文章较全，后已附有未列入的文章目录。由此可见，他六十年来的^{公开}学术活动也是富有成就的。